

# 陈元晖文集

上卷



G40  
C490  
1

731

# 陈元晖文集

上卷



A0874475

福建教育出版社

# 中国教育学七十年

(1991年)



## 一 前 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历了 70 年,人生七十,被称为“古稀之年”,但在 4000 年文化史发展的过程中,70 载只是“一瞬间”。虽然在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只是一段短暂的过程,但对中华民族所产生的冲激和洗涤,却超过以前所有历史时期。在这 70 年间,我们却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新事物,这些新事物是 70 年以前所未出现过的东西。以前只是幻想中的东西,逐渐都成为现实。以前只是一种理想,现在都成为事实。自然的奥秘,以前没有被揭露,现在都成为人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多少年来月球被视为是嫦娥居住的地方,有多少诗篇是在歌颂明月,幻想嫦娥,现在人类竟然能登上月球。“千里眼”、“顺风耳”,只在幻想的小说中出现,现在利用高倍数望远镜,竟然能看到上百亿光年以外的类星体。地球的东西两端,可以直接面谈。这些都比“千里眼”和“顺风耳”高过多少亿倍!世界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也在惊天动地的前进。70 年是前进的 70 年,是赛过过去 5000 年。当今,还有不少的老年人是亲眼见过 1919 年的天安门前的学生游行,有的还是参加者,有谁能想到现在坐在家里能看到世界和全国当天所发生的事情,能听到世界和全国当天所传来的报道。

中国 70 年的变化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那时以来,我们加强了中西文化交流,从西方汲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方面的最新知识,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文化发展局面。新文化运

动使各门科学都不能不考虑各自的前途,改革各自的因循守旧的状况,丢掉各自的故步自封的局面。新文化运动通过百家争鸣的途径,得出了共同的为各门科学所能普遍接近的结论:要科学,不要迷信;要民主,不要专制。摆脱迷信与专制,是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下取得的。新文化运动给我们送来了八字金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新文化运动在政策上的总结。过去的70年,我们执行了这一个发展文化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今后的70年,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必须继续执行这一经过历史考验过的政策,这应该是不用犹豫的。

## 二 从唯理论到经验论

文化是人类进到文明时期所表现于科学、教育、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的综合体,同时,它还表现在一个民族的思想、信念、审美观念、价值标准的体系中。五四新文化运动范围很广,包括上述的文化各个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学艺术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和新政治思想的提出,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新教育思想之代替旧教育思想。文化一词,在西方的语言中含有培植、培养的意义,所以文化和教育的关系,更是密切而不能分离。教育水平往往成为文化水平的同义语。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教育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学校制度,课程内容,教学方法,都有重大的改革,所以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的新教育运动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是有当时的时代潮流支配的,这表现在教育学一门学科的改革上,尤其明

显。五四以后的新教育运动的产生,是受一种新教育理论的指导的,所以总结这一次的教育运动,应从总结指导这一次教育运动的理论着手,即从教育学着手。教育理论往往是支配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是运动的精神支柱。五四以前,指导当时教育行动的是唯理论的教育思想,五四以后就急速地以经验论教育理论代替唯理论教育理论。五四以前,京师大学堂成立(1898年),在这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的大学里,即有译书局的设立;该书局(1903年)译有《坵氏实践教育学》5册,《欧洲教育史》3册,《格氏特殊教育》1册,《独逸教授法》1册。“独逸”即“德国”(Deutsch)的旧译名。接着,在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速成师范学校学生编有《教育学》、《教育史》讲义,曾由四川提学使送请清政府学部审查,因为取材过于日本化,经学部批斥,不许使用。同年,文明书局出版了《小学校训练法》、《平民教育法》两书,也由于日文语气太重,遭学部批驳。这一年,由孙清如从日文译出的《教育史》,学部批准作为参考书使用。商务印书馆编的《教育学》教科书和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教育史》,是作为这一年的师范学校教科书发行。次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新教育学》教科书和蒋维乔著的《学校管理法》,这后一著作,学部批示,认为颇多经验有得之作。京师大学堂设师范馆,教育学为共同必修的科目,所以大学最早开设教育学是从这时开始(1902年)。师范馆有不少日本籍教师,其中名为服部宇之吉是教授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课程,当时称“正教习”。日本从明治天皇执政(1867年)后,向西方国家学习,教育思想从德国传来的居于领先地位;康德的哲学思想和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成为日本的重要思潮。所以,中国近代从西方传来的教育思想,首先是学习德国的。德国的教育学输入中国,是通过两条路进行的:一条是直接翻译德国的著作,如上述的《独逸的教授法》及其他德国教育学原著;一条是间接从日本籍教师讲学和翻译日本师范学校教育学教科书所取得

的德国教育学知识。德国的教育学,主要是属于赫尔巴特系统的教育学。这里要特别提到教育思想家蔡元培在传递德国教育思想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的作用比上述的两条道路的传入,影响更大,他是当时的教育理论的唯理论路线的代表人物。

蔡元培成为唯理论教育思想的代表,由以下几个事实足资证明:

(一)他在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发表了《对于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用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五项教育宗旨,来代替清政府所公布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内容。新的五项宗旨中,去掉忠君、尊孔,这是时势所趋和政治上的需要,这是理所固然,众所晓喻。至于所说的世界观教育,则是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学史上首先提出的。他在这一篇文章中用较多的篇幅来说明世界观教育的意义和内容。他认为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区别:“前者相对,而后者绝对;前者范围于因果律,而后者超轶乎因果律;前者与空间时间有不可离之关系,而后者无空间时间之可言;前者可以经验,而后者全恃直观”。“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这里所引的蔡元培对世界观的解析,显然是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蔡元培曾在1909年至1911年进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1913年7月他辞却教育总长后仍到该大学续学。他在大学听著名心理学家兼哲学家冯德的哲学史课。冯德是受康德影响的哲学家。蔡元培的这一段学习经历,使他间接从冯德那里接受了康德的影响。这就使他的初期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唯理论的特征。

(二)从他的美育思想来看,更增加了他的唯理论的色彩。他在上举一文中说:“欧洲近代教育家,如海尔巴脱(今译赫尔巴特)氏



纯持美育主义。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在五項教育宗旨中，实利教育和美育并持，但他着重于宣传美育的重要性，这从他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讲演中可以得到证明。1917年，他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题目为：《以美育代宗教说》，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6号。他指出：“要之美学之中，其大别为都丽之美，崇闳之美（日本人译言优美、壮美）。而附丽于崇闳之悲剧，附丽于都丽之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以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阴鹭、攻击异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为耶”。这是重要的美育论文，他把美育看作具有德育效能的教育手段。它不仅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性，而且通过美育可以破人我之见和去利害得失之计，达到高尚的道德情操。五四以后，他曾在湖南作过多次美育的报告，他曾介绍康德的美学思想，认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版以后，美学遂于哲学中占重要地位；哲学的美学由此成立。他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评定人类知识的性质，《实践理性批判》是评定人类意志的性质，而《判断力批判》是评定美感。他指出康德的重要主张就是优美和壮美完全属于主观，完全由主观上想象力和认识力的调和，与经验上的客观无涉。蔡元培对康德哲学很谙熟，这是他在德国学习的结果，使他在教育的基本理论倾向于唯理论一方。五四以前，中国教育学倾向于唯理论一方，主要是受康德和赫尔巴特等人的影响，而传递这种思想的影响，蔡元培是处于重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应该在中国教育史上突出地指出。

蔡元培提出的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的教育思想，很明显是受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影响，但他的注重德育的教育思想，也不忽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对他的德育思想的影响。蔡元培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第4卷第6期（1912

年9月)发表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曾这样说:“故欲提倡实利主义,必先养其道德。至于军国民主义之不可以离道德,则更易见。……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从前言人才教育者,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可见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如公民道德是。其他因时势之需要,而不能不采用,如实利主义及军国民主义是也。吾人会议之时,不可不注意”。蔡元培认为,五项教育宗旨中的实利主义教育和军国民主义教育是因时势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而道德则是永恒的范畴,“是百世不迁之主义”。这种思想不能不认为是受康德的道德论的影响。道德是永恒的,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结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在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这一句话,后来就把它刻在康德的墓庐的墙壁上。

蔡元培所提出的五项教育宗旨,是当时的教育上的指导思想,为教育理论界确立理论建设的方向。这五项内容,是用来否定清政府在废科举、兴学校时,所提出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清末所提出的五项内容,是清政府采纳了孙家鼐和张之洞为他们所设想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策在教育上的具体实施。忠君和尊孔是体现“中学为体”的要求,尚公、尚武、尚实则是“西学为用”的需要。蔡元培所提的五项教育宗旨,完全废除了忠君、尊孔的规定,尚公、尚武、尚实也完全更换了它们的意义和内容。蔡元培提出的五项教育宗旨,是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康德哲学影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当时无论是教育学教科书或讲授教育学的教师,多是来自日本的,这又作何解释呢?这其实很容易说明:因为当时日本也是学德国的。康德哲学在日本是很盛行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学习德国成为当时的风气,学院德国化,选派留学

生和聘请教师也都倾向于德国,东京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井上哲次郎于1884年被派往德国研究哲学,又从德国聘请布塞(L. Busse)来日本教授德国哲学,他在大学就是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作课本。井上哲次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教育与宗教的冲突”,在明治26年(1893)发表,文中指出教育与宗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著有《伦理学新说》一书,认为欲知“伦理之大本”,必理先知作为“宇宙之本体”的“普遍存在”(universal existence)。“普遍存在”这个概念,不但相当于斯宾塞的“不可知物”(unknowable)和康德的“自在之物”(Ding an sich),而且相当于儒家的太极和佛教的“如来藏”。与井上哲次郎齐名的还有大西祝,他在188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在早稻田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哲学,明治31年(1898)留学德国,在日本被称为“日本的康德”。由于布塞在日本讲授康德哲学的影响,逐渐开始了德国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1891年日本的“哲学会”主编的《哲学会杂志》,连续刊登了中岛力造(1858—1918)的《康德的批判哲学》及以后的桑木严翼所著的《康德与现代哲学》(1917)一书,对康德哲学在日本的影响,都起了扩大的作用。日本的教育学在当时是受了康德哲学的影响,而当时的中国教育学,一方面直接从留德学生中传来的德国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从日本间接传来这种影响,这些都是从翻译日本的教育学教科书和聘请日籍教师传来的。

五四运动是一个分水岭,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之前,从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到《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讲,唯理论的教育思想,很明显地以他为代表表现出来。五四运动以后,教育学来了一个急转弯,从倾向唯理论,转向到经验论方面一边倒的新形势。产生这种形势,不能不提到杜威的来华对中国教育理论的影响。杜威从1919年5月1日到达中国,1921年7月11日离开中国,在中国的时间长达2年2个月10天;到过北京、上海、奉天(辽

宁)、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共 13 个省市。由于他在华时间之长和所到的地方之广,超过一般的来华讲学的学者,所以他的影响就比其他学者广泛。他在北京,由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尚志学会和新学会邀请,作了 16 次讲演,讲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道德问题”5 个问题,当时北京的“晨报社”,曾把这 5 个问题的演说词,汇集成册,用《杜威五大讲演》为书名出版。他在 1920 秋至 1921 年夏,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课程,教了 1 年。所用课本就是杜威 1916 年的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当时由常道直记录下来的讲稿,书的译名为《平民主义与教育》;1928 年由邹恩润把原著全译出来,书名改为:《民本主义与教育》。“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平民主义”都是(Democracy)一字的中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一本外国教育学著作在中国流传之广和流传时间之久,尚没有另一著作可以与它匹敌的。就杜威本人的教育学方面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在中国流传还有不少,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除邹恩润译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外,尚有朱经农、潘梓年合译的《明日之学校》,丘瑾璋译的《教育科学之资源》(The Source of a Science of Education),孟宪承、俞庆棠合译的《思维与教学》,张裕卿译的《教育之上兴味与努力》(Interest and Effort in Education),董时光译的《今日的教育》(Education To-day);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刘衡如译的《学校与社会》及元尚仁译的《教育原理》等书,其对中国教育学理论的影响,均不及《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影响力。旧中国本世纪 20 年代至 40 代年初,大学中的教育学课程和师范学校的教育学教科书,几乎都是以《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为蓝本,或者加以扩充,或者加以删节,来充当讲堂上的教材。杜威的经验论教育思想,更确切地说,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当时的大部分教育学者中,占有支配地

位。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主义”、“从做中学”这一系列的教育观点，成为当时教育理论界时髦的观点，从大学的校长、教授，到出版界的总编辑，到中小学教师，都对这一位教育学家敬礼有加。中小学校中大力推行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与杜威的教育思想和影响有关。这时，唯理论者所提倡的美育、世界观教育和“未来教育”就销声匿迹，实用主义者的叫声就甚嚣尘上了，教育学就从唯理论转到经验论、转到实用主义的轨道上去了。这是70年教育学的第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延续的时间很长，几乎占这70年的时间中的一半。

唯心论的经验论的教育思想之所以能占领教育理论阵地，不仅是因为杜威亲自到中国来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口讲指画，当面传授，还由于当时民众的政治要求，而错把他嘴上所讲的“民主主义”，作为真正的群众掌权的民主看待。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变，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民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所以普遍欢迎关于民主政治的宣传。杜威所标榜的“民主主义”，正是适合于当时的民主要求。当时的教育界把“民主主义”翻译为“平民主义”，以后又把这一个词译为“民本主义”，都反映当时教育界对民主的愿望。其次，辛亥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了8年，但教育制度仍是沿袭旧的一套，教学方法仍是“先生讲、学生听”的注入式方法，师生关系仍是保持“师道尊严”的校风，教师耳提面命，学生俯首帖耳。教育从制度到方法，都迫切需要改革，这时输入一种新教育制度和新教学方法，当然为教师们所欢迎。想破旧立新，但迎来的却是以错易错，以儿童中心代替教师中心。其三，实用主义教育学流传中国有它的先行的经验论哲学基础。洛克的唯物论、经验论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早在实用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就由梁启超、严复等有名学者介绍到中国来。实用主义是经验论的亚种，是一种向唯心论转变的时髦的经验主义，不免有人错把杜威当

洛克,把他推到中国的讲坛上来。其四,当时的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我们是曾经向德、日两国学习过,由于对德、日两国的失望,使中国转向美国,从政治制度到教育制度,都是以美国马首是瞻,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涌进中国,这是政治为其开辟道路,国际政治情况和国内政治情况,都有利于美国的教育学说的输入。其五,杜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和教育学教授,这是一所在美国享有盛誉的学府,中国留美学生在这一大学毕业的不少。这些毕业回国的学生,不少在中国是有名的教授,在国内最高学府中都据有高级的地位。胡适就是杜威的学生,老师从美国来华,学生就亲当翻译。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处的讲演,也都是由杜威的中国学生当翻译。学生恭维老师,自然也是弟子应尽的职务。杜威的教育学说经他的学生的推广和讲解,也就“相得益彰”了,它能广泛传播,这也是其原因之一。

继杜威来华,接着就有罗素的来华,他于1920年来中国讲学,是杜威向北京听众介绍的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之一,其他两个是詹姆士和柏格森。罗素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杜威介绍了他们三本著作,即《社会改造之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政治的理想》(Political Ideals)和《自由之路》(Roads to Freedom)。1921年,孟禄来华,他是芝加哥大学教育学教授,美国的中国学院创办人和院长,他和罗素先后相继来华,对中国接受西方教育理论,都有一定的影响。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到桑戴克这一位心理学家,他不仅对中国的教育心理学有较大的影响,他同时又是一位教育学家,他的教育学著作,在当时也流行很广,例如他和盖茨合著的《教育之基本原理》(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ducation)一书,就有6种中译本,由熊子容、雷通群、宋桂煌、王巧萍、贡志容、陈衡玉6人同时各自译出,在世界书局、新亚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南京

书局、大东书局 6 家出版机关同时出版。一本译著有这么多出版机关竞争发行,说明它的社会需要量很大,它的影响也就很广泛。这一书的中华书局译本是 1934 年初版,由王巧萍译出。内容分“教育的范围”、“教育之最后目的”、“目前教育的重大需要”、“学习的主要特性”、“学科与活动的选择”、“教学法”、“教育结果的评鉴”、“小学中学与高级学校之职能”等共 14 章,这是与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同样流行的从美国传来的教育学教科书,对 40 年代以前中国自编的教育学课本是有影响的。

### 三 从经验论到唯物论

经验论(唯心的)和唯物论(辩证的)几乎是同时传进中国的,都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从西方传来的。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革命理论,使中国革命志士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以它为革命行动的指导,以它为行为的准则。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于 1918 年,连喊出三个“胜利”:Democracy 之胜利,庶民的胜利,Bolsherism 的胜利。如此大声疾呼,是受到十月革命的鼓励而情绪如此高昂和激动。进步学者蔡元培也是在 1918 年 11 月于天安门前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演说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北京大学于 1919 年 3 月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邓中夏是该团发起人之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于 1919 年 2 月组织了“工学会”,主张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提倡学生学会做工,并帮

助劳动者求学。他们认为“求真知必于劳动中得之”，并指出劳动是“道德之母”，提倡劳动主义，通过劳动把智育和德育结合起来，达到“开平等自由之宝路，促大同世界之实现”的教育长远目的。赵世炎也在此时提倡“工读主义”，他在1919年5月5日出版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69期上发表了《工读主义与今日之中学毕业生》一文，主张“工者既可读，读者亦何尝不可工？”他到法国勤工俭学，成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受杜威教育学说的影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又有“平民教育社”的组织，于1919年10月10日出版《平民教育》周刊，主张通过教育革新去改造社会，认为教育的“根本改造”是社会改造的根本。五四运动时期，左派和右派都一同提倡平民主义教育，但到五四运动以后就分道扬镳，大相径庭了。这主要是对平民主义(或译民主主义)的解释的分歧上。李大钊同志在《平民主义》一文中说，列宁于1919年4月15日在第三国际大会上就指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Bourgeois democracy)和无产阶级民主主义(Proletarian democracy)的区别。“工人政治”在本质上也是民主主义的一种。“共产主义的政治学者，所以必须另立新名的原故，乃是因为‘平民主义’的名词，已为资本主义的时代用烂了，已为卑鄙的使用玷污了。是‘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意思”。<sup>①</sup> 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本来对我们的理论界有条件建立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唯物论(辩证法的)教育学，但当时首先由于政治上无权，所以必须集中力量作政治斗争。有了政权，才会有教育权，才有可能进行系统的教育经验的总结，有了此种总结，才能有一套完整的唯物论教育理论体系。从五四运动以后，延续10年，第一部唯物论的教育学著作，才由李浩吾(杨贤江)于1929年编写出来，1930年2月由上海南

<sup>①</sup>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6页。



强书局出版。这一部以《新教育大纲》为书名的著作，是力图以辩证唯物论观点，分析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问题，指出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批判美国的教育，介绍苏联的教育。全书共3章，16节，20.8万字。每节之后，附有问题若干，这是以教科书形式编写的教育学著作。三章是：第一章“教育的本质”；第二章“教育的进化”；第三章“教育的概观”。在“教育的本质”一章中，他指出教育的上层建筑的性质，指出教育跟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变迁的事实，并批判了“教育四说”和“教育三论”的错误观点。所谓“四说”，即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所谓“三论”，即教育万能论，教育救国论，先教育后革命论。他并指出教育的阶级性，认为阶级性教育表现出五大特征：1. 教育与劳动分家；2. 教育权跟所有权走；3. 专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4. 两重教育权的对立；5. 男女教育的不平等。在“教育的进化”一章中，叙述了从原始共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发展的简史，指出教育的社会、历史性质。在“教育的概观”一章中，他分析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和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并批判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和赞扬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教育。读完全书，很明显地看出作者是以唯物论（辩证的）为指导，从宏观方面考察了教育的性质，教育的历史，教育的国际现状及趋势，体现了一个唯物论者的努力。同时也明显地看出作者对微观方面的分析薄弱，对教育学的组成部分，即如何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都来不及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成系统的理论，可以说（严格地说），这是一本唯物论教育学的导论，导向更深入、更完备的教育理论的启蒙读物，但它仍不失其第一本唯物论教育理论著作的光荣位置。如果把这一本书比作新生的婴儿，自然不免是脆弱的，但发展成长就会是壮健的青少年。

《新教育大纲》出版后仅仅4年，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钱亦